



区域视角下抗战史研究的新探索

2018年11月3—4日,“第二届抗战区域研究暨湖南抗战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常德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抗日战争纪念网共同主办。在开幕式上,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教授作了题为“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最新研究”的报告。研讨会分六个场次,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27篇参会文章综述如下。

一、日本侵华和沦陷区抗战研究

日本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半国土,扶植伪政府,推行殖民政策。在沦陷区,中国人民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本次会议的多篇文章分别对东北、青岛、北平、豫东、上海、靖江等沦陷区的日本侵略和伪政权统治进行了探讨。

张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海军》一文指出,日本海军也曾参与九一八事变及其间的作战。该文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与“舰队派”之间围绕是否出兵协助陆军产生的分歧。经过斗争,“舰队派”掌握了主动权,日本海军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军事行动,并在中国沿海不断增兵,为上海的战事做了准备。故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同步开展的侵华行动。

赵秀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抗战时期青岛沦陷区鸦片统制政策述论》一文,阐述了华北伪政权和青岛沦陷区的鸦片统制政策及运作方式,分析了两个区域的异同,指出了日本在青岛地区鸦片统制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危害性。

魏坡(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沦陷时期北平房荒问题与日伪“治理”》一文,描述了日军占领下北平住房紧张问题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认为日伪政府“治理”房荒的措施效果十分有限,文章从房荒问题的治理角度揭示了日伪当局实施殖民统治的本质。

姜子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寄食与竞食——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粮食榨取与伪政权文武组织的互噬》一文,考察了豫东沦陷区的伪军和伪政府之间因争夺粮食而产生的矛盾。文章分析了抗战以前豫东地区的军事化组织以及豫东沦陷后的伪军组成,区分了正规伪军和地方伪军的差异,指出伪军掌握地方实权,寄食于地方,从而挤压了伪政府的财政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竞食和互噬,反

映了沦陷区日伪统治的内在矛盾。

殷九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1939—1941年日本在华媒体对英国殖民者形象的塑造与宣传——以国策报纸〈大陆新报〉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日本在上海的国策报纸《大陆新报》中塑造和宣传的英国殖民者形象为切入点,论述了日本在宣传舆论上为侵华活动寻求正当性、合法性的图谋。《大陆新报》将英国殖民者塑造为旧秩序的维护者、非正义的代表、新秩序建设的破坏者,作者认为这种形象塑造的目的在于将日本树立为驱逐西方殖民者,维护东亚各民族独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正义者”形象和身份,揭露了日本这一宣传手段的本质。

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敌军工作视域下的“靖江事件”》一文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军工作在区域抗战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事例。1943年江苏省靖江县,伪警察局长和伪军师长由于利益冲突发生矛盾,新四军巧妙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将被指责“通共”的警察局局长反正,壮大了抗日力量。作者分析了这次敌军工作取得成功的各方面因素,认为正确的政策、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强大的武力后盾缺一不可。

陈佳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美国对汪伪政权及国共敌后工作的考察与评估(1940—1945)》一文使用了丰富多样的美国外交、情报及军方资料,指出美国对于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的统治实力以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汪伪统治区内的竞逐博弈十分关注,并通过其在华外交、军事和情报人员调查收集各方面信息,考察与评估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发展前景,从而认识到国民党逐渐失去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现实,因此开始加强与中共的接触,这对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

二、正面战场研究

正面战场,通常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路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在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逐步南移,敌后战场不断扩大。1938年10月之后,直到1944年春季,两个战场的位置和界线相对稳定,即包头—黄河—风陵渡—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岳州—九江—芜湖—杭州。此线以南以西的地区为正面战场,以东以北的地区为敌后战场。^①本次会议上讨论正面战场的文章不多,但各有新意。

鲍梦隐(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再论花园口决堤对抗战格局的影响》一文全面讨论了1938年花园口决堤对抗战格局的多方面影响,分析了黄河决堤的条件和围绕其发生的争论,指出水攻利器对抗战的有效作用,认为决堤阻滞了黄泛区的经济发展,破坏了日军殖民养战的图谋,保护了豫西北地区的安全。

隆鸿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士兵训练与武器装备——以第九战区为中心的研究》一文,着眼于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士兵训练和武器装备问题。以第九战区的湘北等地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全面抗战中期士兵训练教育和武器装备情况,认为第九战区的士兵训练尽管存在不足,但提高了士兵的军事素质,使军队战斗力有明显提升,并在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朱清如(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的《常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一文,指出常德在历史上特别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着重分析阐述了常德军民反细菌战斗争和常德会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常德抗战斗争中发

①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挥了积极作用。

李浩(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军民合作”下的全民抗战武装总动员——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一文,探讨的是广东地区的民众武装抗日问题。文章考察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广州战役之前,国民政府广东当局动员民众组建自卫团的情况,认为在“军民合作”运动下,民众自卫团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对日军作战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战斗力,并在1939年之后成为广东抗日游击部队的主要来源。

三、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研究

敌后战场是指“日军正面推进线后方的抗日战场”。^①本次研讨会上,对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的探讨体现了新的研究进展。

白路(吉林大学中国史系)的《由分散到集中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哈东抗日武装斗争》一文,考察的是东北哈尔滨以东诸县抗日游击区内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及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其主要方法和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集中统一能够实现的关键。

王安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的《舍枪制弹:抗战时期中共军工生产策略的抉择》一文指出,1938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向共产党的武装队伍拨付武器弹药,作战缴获所得也不能满足弹药需求,于是,中共在全面抗战初期即开始重视军工生产,抗战前期曾集中精力制造枪支,但因环境和条件限制,在抗战后期确立了“舍枪制弹”的方针,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世超(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与中共政权——基于1940年肥城“红五月运动”的探讨》一文,关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在一个具体区域的独特表现,考察了1940年山东肥城“红五月运动”兴起的背景。该运动由借粮开始,随后在反封建顽固和锄奸反特中出现过火偏激现象,局势一度恶化,后经山东党组织的纠偏工作,才使当地的抗日形势转危为安。

张雨新(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卫生下乡:现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对接的路径选择——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卫生运动为中心的分析》一文指出,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流行赤痢、伤寒、急性肠胃炎等传染病,病死率高,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解决。文章从卫生下乡的视角考察了该地区推行的群众性卫生运动,认为这种卫生运动既达到了防治疫情蔓延扩大、改善卫生状况的目的,也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对接。

四、大后方研究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主要是指我国的西南、西北地区,也包括从绥远省西部往南经陕西、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西部一线地区。学界对大后方区域的抗战研究近年来逐渐加强,本次研讨会将有7篇文章展示了这方面的成绩。

刘东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探析(1938—1941)》一文,考察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创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认为它是国民党与中共争取流亡青年,解决政工干部不足等问题的产物。文章指出,该训练团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军队中下级干部,推

^① 荣维木:《抗日战争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7页。

动了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发展。但是,训练团成立后受到各方势力的制约,到1941年即告结束,这反映了国民党的战时青年工作与军队政工制度的诸多困局。

张若愚(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抗战建国:绥远省国统区社会动员事业之管窥(1937—1945)》一文,研究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绥远省政府尊奉“抗战建国”宗旨,在绥远西部及河套地区实施民众动员以补充兵源,兴办战时教育以培养抗战人才,推进民族团结以鼓励共同抗日等工作。该文认为绥远省的社会动员事业取得了积极效果,推动了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反映了国民党抗战动员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李常宝(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从应对到支应:战时国民政府兵役管区制到国民身份证制的观察——基于川省民国档案的考察》以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实施与变化为主线,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兵役管区制度的过程,指出全面抗战开始后大片国土沦陷、人力资源丧失,为了确保兵源,国民政府推行了国民身份证制度。认为这个过程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征兵行政存在着从主动应对到被动支应的转变。

江轶(湖南工业大学)的《从“合作”到“合并”:基层视野下国民党与三青团关系再研究——以湖南为例》一文,考察了湖南区域在抗战时期兴起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过程,论述了双方从合作到冲突再到合并的演变过程及其缘由,反映了国统区基层政治的困境和国民党最后走向失败的症结所在。

曾嘉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民国时期湖南第一纺织厂之考察——以抗战时期为重点》根据翔实的史料,采用数量统计方法,阐述了湖南第一纺织厂在九一八事变、世界性经济危机、大水灾、日本企业竞争等种种困难下顽强维持生产的历程。该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经沅陵县柳林汉,迁往安江镇复工经营,产品主要供应军队和机关事业单位,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一文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的治理以及校长赖琏的作用和贡献。文章着眼于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认为国民党CC系要员赖琏实际上成功地实行了“以党治校”。该文同时分析了赖琏的治校之道,肯定了其正面作用。

崔耀鹏(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的《论青海抗战文化的内涵、特点与作用》一文表明,青海地区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加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文章分析了青海地区抗战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曲折性等特点,提出了该地区抗战文化研究课题的价值。

五、侵华日军罪行和暴行研究

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和暴行是抗战研究的重点课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具有突出的区域性。本次会议对日军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和细菌战进行了讨论。

1943年11月4日,日军对福建永安实施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中国平民伤亡,是无差别轰炸的典型事例。胡锐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永安浩劫”与高熊飞的“对日民间索赔案”》一文,根据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梳理了“永安浩劫”的经过。文章考察了受害者之一高熊飞收集证据,并在1992年后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的经历,同时展望了对日索赔诉讼的前景。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实施细菌战,特别是进行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菌攻击,这是目前需要推进的研究。罗运胜(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的《略论侵华日军实施的霍乱细菌战》一文,概述了侵华日军实施的霍乱作战次数、地域范围、受害者人数,分析了日军霍乱细菌战的危害,指出抗战时期中国的霍乱疫情与侵华日军霍乱作战的密切关系,探讨了侵华日军霍乱细菌



战的特点和规律。

王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战俘有关山东“霍乱作战”供述分析》一文,选取了参与1943年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部分战俘供词,按月日时序排列史事,详尽考察了当年日军在山东实施霍乱作战的经过,对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张华(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的《日军侵滇细菌战史再探(1939—1945)》一文,剖析了国内外对日军在入侵云南时实施细菌战持怀疑态度的各种观点及其论据,论述了日军侵滇的战略目标和采取细菌战的联系,勾勒出日军侵滇细菌战的证据链,驳斥了否定日军侵滇细菌战的观点。

六、抗战区域研究的理论探讨

抗日战争的区域性决定了抗战研究区域史取向的必要性,但是较少有文章专门针对抗战区域史理论发表系统的看法。此次会议上,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概念·内容·史料:抗战区域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概念、内容、史料等方面辨析了抗战的区域研究问题,指出应重视日记、歌谣、民间文书、标语文告等非传统文献史料,并开展田野调查,将研究重心下移至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参会论文的研究方向广泛,反映了当前的抗战区域性研究正在日益细化,一些看似碎片化的小问题,整合起来却能展现抗日战争的具体面相和丰富特征。最后需要指出,除了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研究者还应关注国共、中日、中美、日美之间力量交错的区域。既然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那么任何区域都不会置身事外。

〔作者罗运胜,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Chengdu. However, the careles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its ruling logic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and the Internal Disputes in Japan in 1941 Zhang Zhan(68)

After recognizing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r consumptions, decided to give priority to obtaining war resourc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This policy brought great practical pressure to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Wang Jingwei was eager to visit Japan and requir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adjust its policy towards Wang, but it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use of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in 1941 was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gans in China reached a consensus ou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ess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also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interests competi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give Wang high-standard treatment, but did not make substantive adjustments to its policy.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eventually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event expected by him into an ordinary ceremonial visit, which was also the result of a balance of disputes within Japan.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Detention by the British-Myanmar authorities to the Foreign Loan Materials for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Shuangwen, Ye Xin(81)

The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Use of Japan's Compensation Materials shipped to Shanghai after the World War II, 1947 – 1958 Xu Kun(9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cept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in advance and to bear the costs of transportation, storage, unloading and reloading. Facing multiple restrictions on funds, capacities and technologies,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help of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reluctantly shipped all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o Shanghai Port. However, after being handed over to the concerned units, they were unable to be repaired, reloaded and used. In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s defeat was inevitable, it began to demolish and transfer compensation materials and even destroy material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ported away. With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the new established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over the deployment, reloading and use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overall plans and effectively used these materials to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three-year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and to strengthen the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Japan Qi Jianmin(114)

Liu Dania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Zhenkun(134)

A Work of Ultimate Rescue and Standardization—Comment on *The Memory of War: The Oral History of 100 Veteran Soldie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Li Jifeng(138)

Re-exploring the Truth through *Truth* Zhang Jingwei(14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A Summary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sistance in Hunan Luo Yunsheng(144)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Study of the Resistance History in South China Li Hao(149)

A Summary of the Sixth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Siji(153)